敦煌佛經疑難字詞考辨三則[[1]](#endnote-1)\*

張小豔

近十多年來，有關敦煌佛經文獻字詞的考釋與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。[[2]](#endnote-2)筆者近年因工作之需，讀了一些佛經寫卷，遇有不解的字詞，每常參考前賢的研究論著，獲益良多。受教的同時，偶爾也會産生一點不成熟的異見。在此，不揣謭陋，將其中的三則寫成札記，呈請方家指正。

**一、兩**

①Ф168V-2《四部律并論要用抄》：“問：年[云何]滿廿？[[3]](#endnote-3)答：《僧祇》云：要年滿廿歲，滿廿。若年廿，不滿廿，不得戒，但使滿得受戒。若冬時生，夏安居竟受戒，是名不滿廿；若春時生，安居竟受戒，是名滿廿；前安居時生，還前安居竟受戒；後安居時生，還後安居竟受戒，是名滿廿。《四分》家十二月爲一歲，滿廿，人取本生月，皆名滿廿，得具足戒。《僧祇》家逕廿滿，得具足戒。如臘月生者至滿廿，始逕十八，故名不滿。如是等要滿廿夏後，方得受戒。”（《俄藏》4/177B）[[4]](#endnote-4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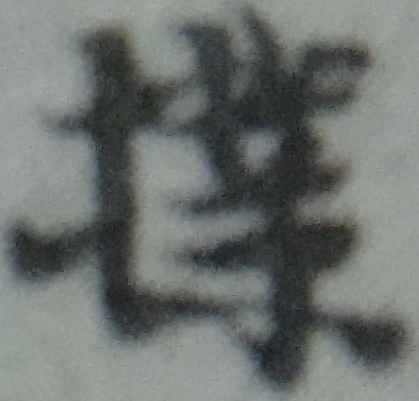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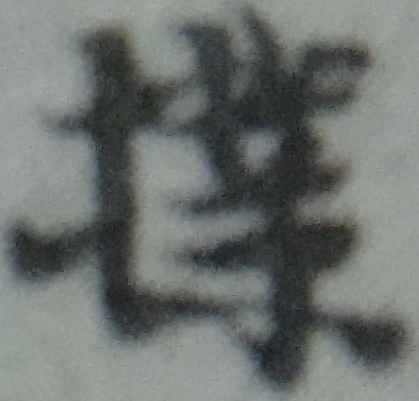
按：例中“”類掃描字形，曾良先生皆録作“兩”。釋云：“‘兩’爲勻衡、相當義。‘廿兩’‘十八兩’相當今之‘二十整’‘十八整’，‘兩滿得受戒’意謂平均起來滿了（年歲）才可受戒。《説文》：‘兩，二十四銖爲一兩。從一㒳。㒳，平分也。’段玉裁注：‘㒳，小徐作兩，誤，今正。“也”字今增，此説從㒳之意。’從段注看來，小徐本已經‘㒳’‘兩’相混。上文敦煌卷子的‘兩’正是‘㒳’的意義，‘㒳’爲本字，義謂勻衡、相當。又《説文》云：‘㒼，平也。從廿，五行之數，二十分爲一辰。從㒳，㒳，平也。讀若蠻。’這兒在此解釋‘㒳，平也’。‘兩’後來代替了‘㒳’字。《説文》‘兩’字段注云：‘今自“兩”行而“㒳”廢矣。’許慎的解釋‘㒳，平分也’‘㒳，平也’，在敦煌文獻中找到了具體語例印證。”[[5]](#endnote-5)上揭例①中所述內容又見於傳世佛典東晉佛陀跋陁羅、法顯譯《摩訶僧祇律》卷十九及卷三八，其中的“”形皆作“雨”，曾氏後又撰文以《摩訶僧祇律》卷三八“佛住舍衛城，爾時世尊制戒，不聽減二十**雨**童女受具足。時諸比丘尼，[滿二十**雨**童女與](file:///C:\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\Administrator\Local%20Settings\Temp\cbrtmp_sutra_&T=1488&B=T&V=22&S=1425&J=38&P=&25240.htm#0_0#0_0)[受](file:///C:\\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\\Administrator\\Local%20Settings\\Temp\\cbrtmp_sutra_&T=1488&B=T&V=22&S=1425&J=38&P=&25240.htm" \l "0_0#0_0)具足。諸比丘尼嫌言：汝滿二十**雨**不滿二十**雨**，誰得知者”等句中“雨”爲例，認爲“這些‘雨’字，義不可通；實際上是‘兩’的字誤。古籍中‘雨’‘兩’形近往往相訛，‘兩’爲均衡、相當義，在敦煌卷子中就保存了正確的寫法”，後即引前揭Ф168V-2《四部律并論要用抄》文例及相關考證進行論述，最後又援唐代墓誌中“明兩”誤爲“明雨”之例作參證。[[6]](#endnote-6)曾氏後文以敦煌寫經Ф168V-2《四部律并論要用抄》中的“”形，推定傳世佛典《摩訶僧祇律》卷三八中的“雨”乃“兩”的字誤。僅就字形論，曾文將“”形楷定作“兩”，可從。然誠如曾文所言，“雨”、“兩”二字形近易混，故上引例①中的“”形是否即“兩”字似還可重新考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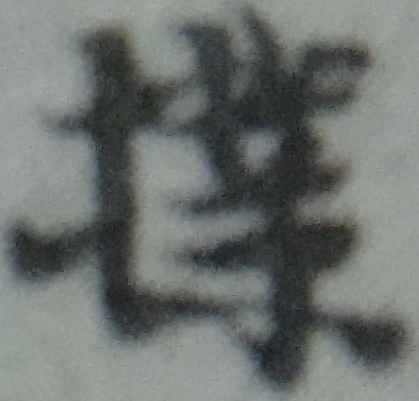
檢敦煌佛經寫卷，與例①所引內容相關的語句亦見于P.2100《四部律并論要用抄》卷上及P.2148《毗尼心》。其中的“”形，P.2100作“”（《法藏》5/187A）、P.2148作“”（《法藏》7/57A）等形。那麽，其形究竟是“兩”還是“雨”呢？僅憑字形，很難將其分清。只有在具體的上下文語境中，根據文意才能確定其是“雨”還是“兩”。從文意看，例①所言是有關受戒的要求和標準的。對此，《四分律》與《僧祇律》兩家所持標準不同：前者較寬，只要從生月算起，年滿二十即可受戒；後者甚嚴，必須年滿二十、又滿二十“”的情況下才能受戒。所謂滿“二十”，就是要滿“二十夏”，如是方能受戒。例中將“”與“夏”等同起來，説明其在語義上具有某種相關性。考慮到佛教戒律規定，僧徒在夏季三月中，禁止外出，專心坐禪修道，即所謂“夏安居”，亦稱“坐夏”；因其時正當雨季，故也稱“坐雨安居”。唐玄奘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二“印度總述”之“歲時”下云：“故印度僧徒，依佛聖教，坐雨安居，或前三月，或後三月。前三月當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，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。前代譯經律者，或云坐夏，或云坐臘。”[[7]](#endnote-7)慧琳《音義》卷五九《四分律》第十二卷音義“百臘”條云：“力盍反。案《風俗通》曰：‘漢曰臘，獵也，獵取禽獸祭先祖也。此歲終祭神之名也。’經中言臘，佛者即此義也。……今比丘或言臘，或云夏，言兩，同其事也，一終之義。案天竺多雨，雨安居，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六日也。土火羅諸國以十二月安居。此方言[夏安居](file:///C:\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\Administrator\Local%20Settings\Temp\cbrtmp_sutra_&T=2206&B=T&V=54&S=2128&J=59&P=&303669.htm#0_0#0_0)，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。各就其事制名也。”（T54，p701b2～5）由此看來，所謂“夏安居”，又稱“雨安居”，蓋因夏季多雨，故或以“雨”代稱“夏”。如此，則例①所謂“滿二十”的“”當是“雨”字，“滿二十雨”就是“滿二十個夏季”的意思。這樣，就不難理解例中所謂“如臘月生者至滿廿，始逕十八，故名不滿”的真切涵義了。其意謂：如臘月出生的人，年雖滿二十，但只經歷了十八個夏季（出生的那年及最後數滿的那年都未過“夏”），不足二十“雨”，所以稱其“不滿二十雨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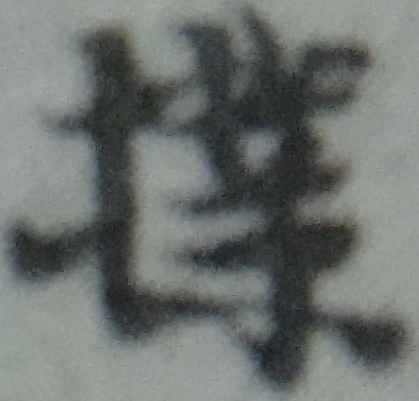
既然“”乃“雨”的手寫，而非“兩”字，那麽曾文所言“許慎釋‘㒳，平分也’‘㒳，平也’，在敦煌文獻中找到了具體語例印證”的説法也就不可爲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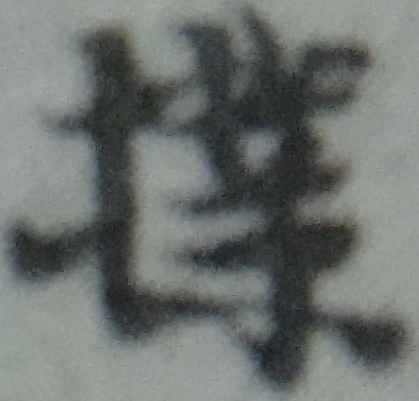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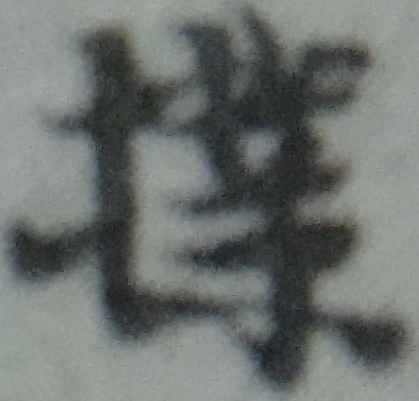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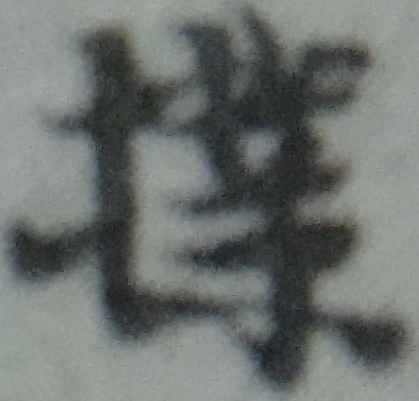
**二、擛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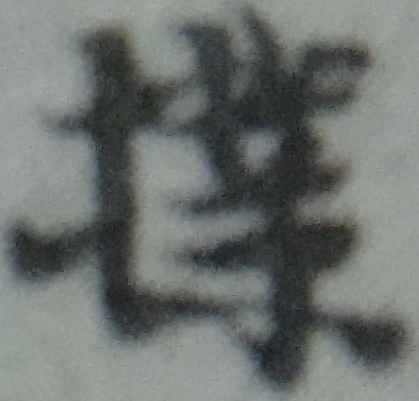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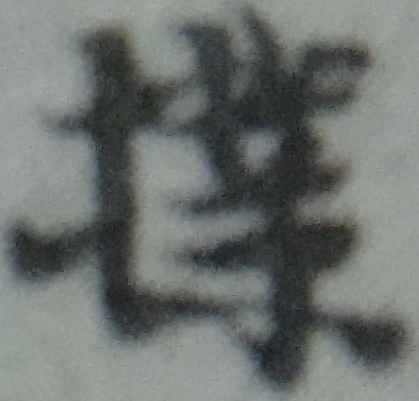
②Ф324《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》：“不覆頭入白衣舍，應當學；不覆頭白衣舍坐，應當學；不頭入白衣舍，應當學；不頭白衣舍坐，應當學。”又：“人覆頭，不應爲説法除病，應當學；人頭，不應爲説法除病，應當學。”（《俄藏》5/185B、186B）

按：例中“、”與“”，曾良先生都楷定作“擛”，釋爲“摇動”。[[8]](#endnote-8)從字形看，“”乃“擛”的手寫，而“、”則是“擛”的避諱改形字，曾録可從。但從異文及其上下文內容相同的用字看，這一結論恐還須斟酌。例②所述內容也見於劉宋佛陀什等譯《五分戒本》卷一，其字作“幞”（T22，p204c15～18）；亦見於姚秦鳩摩羅什譯《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》卷一，其字作“襆”（T23，p477a28～477b2），《大正藏》校記引宋、元、明、宫本作“幞”；又見於BD198《十誦律比丘尼戒本》，其字分别作“、、”三形（《國圖》3/460、461）。總體來看，上引内容涉及的異文共有“、、、幞、襆、、、”諸形。那麽，究竟哪個字形才最切合文本原意呢？

綜合文例、詞義、字形等方面來考慮，竊疑作“襆”是。從文例和詞義來看，“、、”不可能表“摇動”義。因爲在例②從出的Ф324寫卷的下文中，本身就有用“摇頭”的語句。文曰：“不摇肩入白衣舍，應當學；不摇肩白衣舍坐，應當學。不頭入白衣舍，應當學；不頭白衣舍坐，應當學。”（《俄藏》5/186A）句中前一“”漫漶不清，但後一“”明顯就是“摇”的手寫，其出現的語境跟例②完全相同。從戒律的行文來看，似不可能在同一卷內相隔不遠的上下文中，同時出現表意完全相同而用字迥異的情況。既然“、、”不可能表“摇動”，那其義究竟是什麽呢？考慮到例②中“、、”出現的語境都是緊接在“覆頭”之後，頗疑它們的詞義與“覆”近似而略有不同。“覆”者，蓋也，“覆頭”指用布帛等將頭蓋住。而上舉有關“、、”的異文中，詞義與“覆蓋”義近，且可跟“頭”爲賓語的，似乎只有“襆”最相符，因而頗疑其字當是“襆”，其餘寫作“幞、、、、、、”者，或是其换旁異體，或爲其俗寫形訛。

首先，從詞義看，“襆”既可作名詞，表示用以覆蓋或包裹物品的布單、巾帕；又可作動詞，轉指用布單、巾帕覆蓋或包裹物品。如元魏慧覺等譯《賢愚經》卷十二波婆離品第五十：“於時其母聞兒是語，即取寶案，嚴具器物，以[襆](file:///C:\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\Administrator\Local%20Settings\Temp\cbrtmp_sutra_&T=209&B=T&V=04&S=0202&J=12&P=&27322.htm#0_2#0_2)覆上，送以與我，令摩訶男逐而看之。已到我前，發去其[襆](file:///C:\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\Administrator\Local%20Settings\Temp\cbrtmp_sutra_&T=209&B=T&V=04&S=0202&J=12&P=&27322.htm#0_0#0_0)，百味飲食，案器悉滿。”（T4，p435c4～6）後秦弗若多羅、羅什譯《十誦律》卷十九：“佛聞是事，語諸比丘：‘從今不[襆](file:///C:\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\Administrator\Local%20Settings\Temp\cbrtmp_sutra_&T=1498&B=T&V=23&S=1435&J=19&P=&273214.htm#0_4#0_4)頭入家內，應當學。’若[襆](file:///C:\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\Administrator\Local%20Settings\Temp\cbrtmp_sutra_&T=1498&B=T&V=23&S=1435&J=19&P=&273214.htm#0_5#0_5)頭入，突吉羅；不[襆](file:///C:\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\Administrator\Local%20Settings\Temp\cbrtmp_sutra_&T=1498&B=T&V=23&S=1435&J=19&P=&273214.htm#0_6#0_6)頭入，不犯。”（T23，p135c8～9）上舉二例中，前例中“襆”用爲名詞，指覆蓋飲食的布單；後例中“襆”用作動詞，指用巾帕裹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後例出現的語境跟上引例②極其相似，尤可證明“幞、、、、、、”諸字皆當是“襆”的異體或形訛。

弄清“襆”較切合文意後，我們再來看它與别本異文“幞、、、、、、”諸形間的關係。我們知道，形符“衤”與“巾”常義近换用，故“幞”當是“襆”的换旁異體，這也是文獻中“幞”常作“襆”的異文出現的緣故。而“、、、、、”諸形，左旁皆從“扌”，蓋由“衤”旁手寫與“礻”不分，而“礻”與“扌”常因形近訛混所致，例多不贅。“、、”右旁所從似“業”，俗寫“業”與“菐”形近易混，如“僕”作“”、[[9]](#endnote-9)“撲”作“”。[[10]](#endnote-10)“、、”右旁所從“葉”或“𦯧”，可能亦由“業”這個仲介訛變得來，即經由了“菐—業—葉—𦯧”這樣的訛變序列。“菐”“業”相亂，已如上述；“業”與“葉”，形音皆近，也常訛混。很多情況下，我們只能根據上下文語境來判斷其究竟是“葉”還是“業”。如P.2811V《金紫光禄大夫守刑部尚書兼御史中丞侯昌葉直諫表》：“金紫光禄大夫、守刑部尚書、兼御史中丞侯昌直諫表。”（《法藏》18/348）其中的“”，《法藏》題名及唐耕耦、郭峰在他們的整理本中都録作“葉”[[11]](#endnote-11)，非是，其字當爲“業”的俗寫。“侯昌業”乃唐僖宗時期的官員，曾因田令孜專權、惑亂天下而上疏直諫，被賜死內侍省。《資治通鑑》卷二五三“僖宗廣明元年春二月”下：“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，而上不親政事，專務遊戲，賞賜無度，田令孜專權無上，天文變異，社稷將危，上疏極諫。上大怒，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。”[[12]](#endnote-12)是其證。“菐”訛作“葉（𦯧）”的過程，在下面的文例中有直觀的體現。P.3892《佛母讚》：“佛母當時聞此語，雙林裏，魂搥自[□]官（棺）前，天衣寶髻自碎，七孔流血變成池。”（《法藏》29/100B）前字“”形似“擈”，後字“”顯然是“擛”的避諱改形字。從文意看，則都是“撲”的俗寫形訛，“自撲”謂自己摔倒，“撲碎”即摔碎。由此不難看出，“、、”當由“擈”訛變而來。

綜上所述，“、、”，異文或作“幞、襆、、、”諸形。結合文例、詞義及字形等因素看，其字當以“襆”爲正體，其餘諸形或爲其换旁異體（如“幞”），或是其俗寫訛字（如“、、、、、”）。句中“襆頭”指用巾帕裹頭，與前文的“覆頭”意義相屬。以往學者録“、、”作“擛”、釋爲“摇動”，似未中的。

**三 應類 應倫 交類**

③Ф93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卷八：“復次，阿難，鬼業既盡，則情與想二俱成空，方於世間，與元負人怨對相值，身爲畜生，酬其宿債。……[和](file:///C:\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\Administrator\Local%20Settings\Temp\cbrtmp_sutra_&T=975&B=T&V=19&S=0945&J=8&P=&6720.htm#0_0#0_0)[精](file:///C:\\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\\Administrator\\Local%20Settings\\Temp\\cbrtmp_sutra_&T=975&B=T&V=19&S=0945&J=8&P=&6720.htm" \l "0_0#0_0)[之鬼](file:///C:\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\Administrator\Local%20Settings\Temp\cbrtmp_sutra_&T=975&B=T&V=19&S=0945&J=8&P=&6720.htm#0_0#0_0)，和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爲**應類**；明靈之鬼，明滅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爲休徵一切諸類。”（《俄藏》3/58B）

④Ф93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卷八：“彼**應倫**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於交**類**；彼休徵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明類。”（《俄藏》3/59A）

按：曾良先生指出，上引二例中的“應類”、“應倫”、“交類”都指“有雌、雄二性分别的種類”。其立論的依據主要有三：一、“和精之鬼”指和合陰陽精氣的鬼；二、“應倫”“應類”的“應”指陰陽感應；三、“交”指陰陽二氣相接觸，由此引申出交配義，然後便從“陰陽交感”的角度引用各類文獻來論證其意的由來。[[13]](#endnote-13)竊以爲這種理解恐怕偏離了文本的原意。

揣摩文意，上引二例説的是衆生違反戒律，犯下煞生等罪過，死後墮入三塗中的“餓鬼道”；鬼業盡後，投胎轉入“畜生道”，變作畜生來償還前世欠下怨家的舊債。當其從餓鬼轉投畜生時，不同的鬼，因其種性的差異將變作不同的畜類，如“和精之鬼”，生於世間即變成“應類”畜生。舊債償還完畢，再從畜生轉投“人道”，恢復人形。同樣，不同的畜生也會因種性的差異參合於不同的人類，如“應倫”類即參於“交（文）”類。檢核文獻，曾氏據以立論的“交”，原卷作“”，從字形看，確是“交”字，但在句中當是“文”的訛字，《大正藏》所收經本正作“文”（T19，P145b24），是其證。那麽，“應倫”、“應類”、“文類”究竟是什麽意思呢？這或許可從後人爲《首楞嚴經》作的注解中找到答案。宋子璿集《首楞嚴義疏注經》卷八云：“[和精](file:///C:\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\Administrator\Local%20Settings\Temp\cbrtmp_sutra_&T=1866&B=T&V=39&S=1799&J=8&P=&266027.htm#0_2#0_2)之鬼，和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爲應類。因爲見習，鬼作魍魎，精耀之物既盡，爲畜便成應類，即應四時節序來而復鳴者。言和者，雜也，雜精明處而成鬼也。……彼應倫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文類，因從見習。鬼落[和精](file:///C:\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\Administrator\Local%20Settings\Temp\cbrtmp_sutra_&T=1866&B=T&V=39&S=1799&J=8&P=&266027.htm#0_0#0_0)，魍魎報終，畜爲時應，參於人道，微有文章。非正習因，故云參合。”（T39，p939c23～26、～940c14～16）不難看出，所謂“和精之鬼”指雜和有精明、靈性之鬼；“應”謂順應，“倫、類”義同，皆指類別，“應倫”、“應類”即指順應時節而來的畜生；“文”指文章，“文類”謂略通文章的人。後代依《首楞嚴經》而制的懺法中對此也有解釋，如明禪修述《依楞嚴究竟事懺》卷下：“和精之鬼，生爲應類，寒鴻、社燕、春鶯、秋蟲，應時而至。……懺除應倫者，酬足復人，參合文類，稍知章句，妄竊才名之報。”（X74，p534b3、534b20～21）此則明確舉出了“應類”、“應倫”的具體類別，其詞義的內涵無需贅言。綜合言之，上引例③、④句謂雜有靈性的精明鬼，轉投於畜生時，多變作應時而至的寒鴻、社燕等鳥蟲類畜生；這些畜生償還舊債完畢，投生爲人時，則變成略通文墨、稍知章句的文人。

從上文有關“兩”、“擛”、“交類”的考釋來看，敦煌文獻雖然年代久遠，保留了原初抄寫的面貌，免除了後人傳刻的改易，但寫卷本身抄寫時也可能出錯。因此，對其中字詞的解釋，須盡可能在比勘異本進行校正後，再結合文例進行推考。否則，一字之錯，將“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”。

本文原載於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六輯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2月。

1. \* 本文是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專項資金資助項目“敦煌疑僞經校録并研究”（批准號：200712）的成果之一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相關的論著主要有曾良《敦煌文獻字義通釋》，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2001年；曾良《敦煌文獻叢札》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；曾良《敦煌佛經字詞與校勘研究》，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；于淑健《敦煌佛典語詞和俗字研究——以敦煌古佚和疑僞經爲中心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“云何”二字，據P.2100《四部律并論要用抄》卷上校補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本文所謂“《俄藏》”、“《法藏》”、“《國圖》”分别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等合編《俄藏敦煌文獻》（1～17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～2001年）、法國國家圖書館等合編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》（1～34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－2005年）、任繼愈主編《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》（1～146册，北京：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05～2012年），引例後括注的“《俄藏》4/177B”指該句引自《俄藏敦煌文獻》的册數、頁碼及欄次，其餘類推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參曾良《敦煌文獻字義通釋》，第94～9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參曾良、趙錚艷《佛經疑難字詞考》“兩”條，《古漢語研究》2009年第1期，第78頁；又曾良《敦煌文獻叢札》，第146～147頁。此據後者徵引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[唐]玄奘、辯機原著，季羨林等校注《大唐西域記校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16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參曾良《敦煌文獻字義通釋》，第17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參施安昌編《顔真卿書〈干禄字書〉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5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參韓小荆《〈可洪音義〉研究——以文字爲中心》下編《〈可洪音義〉異體字表》“撲”條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9年，第62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唐耕耦、陸宏基《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》第四輯，北京：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，1990年，第331頁；又郭峰《敦煌本〈侯昌葉直諫表〉與晚唐懿、僖時期之政局》，《蘭州大學學報》1991年第3期，第10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[宋]司馬光《資治通鑑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0年，第822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曾良《敦煌文獻字義通釋》，第179～18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